

## 重建觀念史圖像中的歷史真實

——中國近代觀念史研究的新範式

魚 宏 亮<sup>\*</sup>

摘 要

近年來，由於語言哲學的成果被廣泛地應用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通過語義分析來界定觀念的內涵，成為推動觀念史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現代資訊科學的迅速發展，使得傳統文獻數位化、建立大型資料庫成為可能。利用資料庫對關鍵詞進行統計分析，以句子為中心界定詞語的內在意涵，成為新技術條件下歷史研究的新領域。本文以中國近代觀念史研究中的一些新成果與新方法為中心，對新技術與新視野條件下傳統文本的解讀、新材料的應用、觀念圖景歷史真實的建構等問題，結合研究個案做一理論上的探索與說明。

關鍵詞：觀念、關鍵詞研究、觀念史圖像、歷史真實、資料庫

---

<sup>\*</sup> 作者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 **Finding the Truth of History under View of the Concept**

—New Paradigm in Study of the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

Yu Hong-liang

Abstract

Recently, due to the widely application of linguistic findings to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 important new method in advancing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has emerged, that is to determine the connotation of a concept through semantic analysi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science made it possible to digitize the received literature and build large databases. Consequently, a new field in historical research came into being, that is to utilize databases to conduct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keywords and to determine the internal meanings of the words centering on the sentences. Focusing on the new achievement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a's history of ideas, this article explores and explains theoretical issues, such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ceived literature, the application of new material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in the view of the concept, through case studies.

Keywords: concept, keyword research, view of the concept history,  
historical fact, database



## 重建觀念史圖像中的歷史真實

### ——中國近代觀念史研究的新範式

魚 宏 亮

#### 一、前言

二十世紀70、80年代以來，史學的發展發生了巨大變化，過去習慣的那種靜止的、結構式的、有規律的、線性的、有序的、進步的、宏大的歷史觀念越來越遭到質疑，開始特別強調多樣的、隨機的、非線性的、獨特的、另類的、相對的、個人的、能動的歷史觀念。<sup>1</sup> 歷史學家越來越不滿意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上層建築、經濟基礎等結構主義的研究範式，他們開始關注普通民眾、區域、宗族、祠堂、社團，通過不厭其煩的考證來搞清一個制度上微小的細節。在通過這種「碎片化」的研究來抵制宏大敘事的過程中，歷史學者往往產生一種迷失在歷史森林中的迷茫。另一方面，如洪水猛獸般的後現代主義則根本上懷疑歷史學的價值和意義。後現代主義代表海頓·懷特（Hayden White, 1928-）認為：「歷史編纂為有關過去的純粹的事實性記述增添了一些東西。所增添的或許是一種有關事件為何如此發生的偽科學化解釋，但西方史學公認的經典作品往往還增添了

---

<sup>1</sup> 程光泉：〈後現代性與歷史學的焦慮〉，《東嶽論叢》第2期（2004年4月），頁13-17。

別的東西，我認為那就是『文學性』。」<sup>2</sup> 懷特甚至在《歷史學的重負》(1966)一文中說：「在發現藝術的和科學的陳述有著共同的建構主義特徵之後，假定在科學和藝術之間存在十九世紀的許多史學家自信佔據的、並以擁有它為驕傲的那中間地帶消失了」，相比於戲劇和小說家，歷史學家只是「裝作尊重精神的虔誠樣子，只是爲了更好地破壞精神對於創造性個體的要求。」<sup>3</sup>

歷史學研究中的的主觀性早在上個世紀初即遭到蘭克學派重創，在號稱完全客觀的史料的嚴苛審讀中，任何帶有人爲因素的史料都被認爲是可疑的。而後現代主義則乾脆將歷史學家的個人理解當作文學與藝術的虛構與想像，而且更爲拙劣。佇立在懸崖邊上的歷史學，如何安頓歷史學家的個人思想，成爲一個嚴峻的問題。

另一方面，一些歷史學家也開始積極回應後現代主義的質疑。他們正視「史料的純粹性」的爭議，將歷史事實看作「各種參差多相的力量之間的關係網絡，而不是據簡單的因果概念組織起來的互無聯繫的離散單位」，「重構過去不僅僅是簡單地發掘新證據、應用新方法或揭露以前的偏見，它也要求主動介入所有研究都要捲入的知識的產生與傳布的政治之中。故問題不在於怎樣使敘述更少偏見或更少帶有意識形態，而是如何在多重詮釋立場與我們日常應對的權力結構的關聯之中確定我們自己的史學研究的位置。」也就是說，既然我們無法擺脫歷史詮釋中的主觀介入因素，那我們就應當將這種主觀性也當作歷史的一部分，“to engage the past”，在美國歷史學家何偉亞（James L Hevia），關於乾隆時代一場外交風波的研究中，充分體現了這一後現代史學思想。<sup>4</sup> 在史料與解釋之間原本穩定而清晰的關係之間介入一

<sup>2</sup> (美)海頓·懷特著，陳新譯：《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江蘇：譯林出版社，2004年），中譯本前言，頁4。

<sup>3</sup> 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Connecticut: Wiley-Blackwell for Wesleyan University, vol. 5, 1966), 112.

<sup>4</sup> (美)何偉亞（James L Hevia）著，鄭常春譯：《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個後現代式的懷疑之楔，歷史學家不但要探索歷史事實，甚至時時也在反思自身，「把歷史書寫和歷史本身結合在一起進行雙重性透視」，<sup>5</sup>這一全新維度的引入，動搖了傳統史學的許多領域。但新思維在飽受爭議中前行，真正成功的嘗試還有待時間的考驗。<sup>6</sup>

實際上，離開史料與詮釋的視角，從觀念與事實的角度來重新審視傳統學術的各個節點，又可能產生全新的探索體驗。陳寅恪歸納王國維的治學方法「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這個方法後來被稱為「二重證據法」，成為多年來中國史研究所遵循的金規玉律。中國的史學研究向來具有重視文獻的傳統，因此「紙上之遺文」自不必說，這一思想對學界最大的影響在於對於出土材料的重視。綜觀現代史學，一旦有材料發掘出土，學界蜂擁而至，近水樓臺者佔據先機，必先取得成果而後公佈材料，這一學術潛規則中外皆然。這種現象給人造成一種印象，似乎除了新發掘出土的材料而外，再無新材料可言。其實關於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還有兩大法門，除其一外，尚有兩端：「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sup>7</sup>外傳文獻相對於中國傳統典籍來說當然屬於新材料，學界對此用力尚勤。但我們對於中國史上外來觀念的影響，卻很少能夠做到結合固有材料互相參證。近十幾年來，學界的一系列關於中國近代觀念變遷的研究，借助於資料庫系統的新技術手段，參證與糾正了許多觀念史上的重要節點，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利用新方法研究老問題的學術典範。<sup>8</sup>這使得我們得以

<sup>5</sup> 黃興濤：〈「話語」分析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頁150-164。

<sup>6</sup> 有關爭議請參見羅志田：〈後現代主義與中國研究：《懷柔遠人》的史學啓示〉述評，《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

<sup>7</sup> 陳寅恪：〈王靜庵先生遺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19。

<sup>8</sup> 這些成果集中收錄在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一書中。此外，亦可參考以下論作：黃興濤：〈清末民初新名詞新概念

重新審視材料——觀念背景下的歷史解釋。這些研究領域都沒有發現新史料，他們所做出的重要發現借助的都是傳統文獻。從浩如煙海的資料中找出問題的答案，我們不僅需要新的眼光，還需要借助新的手段。這是新材料與新學術的一層新意。

## 二、新視野與新學術

### (一) 以新視野看待傳統文獻

在某些學界歷來視為重鎮的傳統論題領域，發現新材料和新問題變得越來越困難，以致於歷史學者產生「問題已經做完」的焦慮。<sup>9</sup> 這種現象的出現與其說是由於新材料日益稀缺而帶來的歷史學家無問題可供研究的錯覺，毋寧說是由於在新材料缺位的情況下突顯了某些研究領域問題意識嚴重匱乏的傳統局限。

從兩岸三地學術界都十分重視的辛亥革命的研究來看，10月10日發生的武昌起義，是一個由保路運動引起的孤立的小範圍事件。此時的革命家既力量單薄，又沒有充分準備，甚至連領導人都沒有。中

---

的「現代性」問題》，《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頁128-136、〈「話語」分析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頁149-163、192；羅志田：〈抵制東瀛文體：清季圍繞語言文字的思想論爭〉，《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頁57-74、90；沈國威：〈西方新概念的容受與造新字為譯詞——以日本蘭學家與來華傳教士為例〉，《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0年第1期，頁121-134、〈傳教士與20世紀初的新漢語——以A. H. Mateer和E. Morgan的兩本書為例〉，《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頁74-77；方維規：〈「經濟」譯名溯源考——是「政治」還是「經濟」〉，《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頁178-188、209、〈語言與思辨——西方思想家和漢學家對漢語結構的早期思考〉，《學術研究》第4期；孫江：〈近代中國的「亞洲話語」〉，《近代中國與世界——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1卷、〈文本中的虛構——關於「黎城離卦道事件調查報告」之閱讀〉，《開放時代》2011年第4期，頁5-27。

<sup>9</sup> 羅志田：〈史學的眞問題〉，《書城》2007年第8期，頁44-49。



山先生後來也回憶到，武昌起義的迅速勝利是非常僥倖的。<sup>10</sup>但是武昌起義引起的連鎖反應卻是誰也始料不及的：在半個月內，十五個省份宣佈脫離清朝而獨立。這一系列事件加上1912年2月12日清朝發佈退位詔書，被歷史學家建構為辛亥革命事件。這就帶來一個疑問：既然革命黨力量如此薄弱，那麼這場革命的中堅力量是什麼？通過研究發現，立憲派士紳階層乃為革命的主體。<sup>11</sup>但是立憲派是反對革命的，那麼支配這場「革命」的觀念是什麼呢？根據傳統的文獻解讀，在各種各樣的結論當中，我們很難發現令人滿意的解答。

但是根據利用資料庫的檢索和分析，可以發現：1890-1911年間「革命」一詞的使用，在1911年出現在各種載體的文本中「革命」一詞處於次數最低的時期，這與這一年革命運動處於低谷的歷史現象相吻合。<sup>12</sup>同樣，以檢索「忠君」這一關鍵字為例，從1906-1912年中，該詞使用頻率一直處於減少的趨勢。綜合分析這些文本，發現其實「辛亥革命實為清末各省諮議局的紳士積極要求召開國會，發起一次次的挑戰清王朝的行動的邏輯延伸。也就是說立憲派不需要接受『革命』觀念，就可以支持顛覆中央王權的行動。一旦找到支配辛亥革命的主流真實觀念，一條連續的觀念和社會事件的互動鏈條便顯現出來。」<sup>13</sup>由此發現：以「共和主義」作為辛亥革命這一歷史事件的觀念史「圖景」，便更能解釋民國建立後的一系列社會事件。分析這一研究中的方法問題，我們發現核心的支持證據還是在材料上面。但這些材料並不是新發現、未被利用的材料，而是從材料的排列中發現的新問題。

<sup>10</sup> 徐中約：《中國的奮鬥1600-2000》（深圳：中國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頁375。

<sup>11</sup>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

<sup>12</sup> 李炳南：《辛亥革命起因之分析》（臺北：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碩士論文獎助出版委員會，1987年），頁144。

<sup>13</sup> 金觀濤、劉青峰：〈歷史的真實性：試論資料庫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利用〉，收於氏著：《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447。

## (二) 新型資料的出現

此外，近代以來出現了一類新形式的材料，這就是報刊，其中包括圖像。報刊相比於傳統文獻最大的不同是傳播範圍的變化，由報刊所營造的公共空間遠遠超過傳統任何介質的文獻。這也使得依託語言進行傳播的觀念得以影響更為廣泛的社會群體。而觀念作為社會行動的決定性因素，又會轉化為社會事件。所以，從文獻的觀點來看待問題，我們必須引入傳播網路與傳播空間這樣的維度。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晚明的公共空間與晚清的公共空間的傳播效率。晚明的社團很活躍，但資訊傳遞大多通過傳抄與口耳相傳來向外擴散，刻書、抄書等活動亦只在一定範圍內產生影響，其傳播速度與範圍是傳統的。晚清則由於新媒介的出現而發生根本不同。1901、1902年《清議報》連續三期發表介紹盧梭的文章，1903年胡漢民、汪精衛等人就在廣州組織「群智社」以盧梭著作作為指導書籍。從此「天賦人權」、「社會契約論」等思想在中國青年中成為影響最大的新觀念。受張之洞教育思想的影響，杭州有個滿族婦女慧興於1904年創辦了一所專門給予旗人婦女新式教育的「貞文女學」，但由於資金短缺和缺乏杭州將軍的支持，女學面臨關閉。1905年12月21日慧興在絕望中自殺。這一事件經過《北京女報》、《時報》的報導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各階層人士紛紛在報紙上譴責社會以及官員的冷漠，慧興則被媒體稱為「東亞婦女的楷模」。<sup>14</sup>1907年，思想開放的王鐘聲、滿族士人金梁<sup>15</sup>甚至將這一故事編成戲劇在京城募捐時上演。在輿論的壓力下，官府又重建了這所女學，並命名為慧興女學。<sup>16</sup>這所學校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紀50年代。報刊、電報等新媒體的力量可見

<sup>14</sup> 夏小虹：〈王鐘聲與《惠興女士》新戲〉，《文藝研究》2007年第10期，頁153-156。

<sup>15</sup> 金梁亦為民國初年《清史稿》的刊刻者之一。

<sup>16</sup> 路康樂：《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12。

一斑。

新媒體以及其行銷網路的建造，使得知識與思想的傳播在空間上發生巨大的拓展，也極大的縮短了到達終端受眾的時間。毫無疑問，新媒體加快了社會變遷的節奏。<sup>17</sup>

同樣的事情我們也可以用來解釋歷史建構中的假象問題。比如關於「公車上書」的研究，目前存在著很大的爭議。原因在於這一事件的主要文本康有為《我史》、《公車上書記》是事後建構的，而非現場紀錄。根據史家研究，由康、梁聯絡各省舉子進行的上書，是一場胎死腹中的事件，康有為甚至沒有將上書遞出。<sup>18</sup> 其實，如果對材料的介質足夠敏感的話，即可知康有為所述的若干重要環節為不可能之事。康有為自述匯集一千兩百多舉人在北京松筠庵集會，有學者已經質疑該處無法容納如此多人的問題。<sup>19</sup> 通過一晝兩夜的時間草擬18,000多字的上書，這在使用毛筆寫作的時代幾乎不可能完成。更離奇的是這份1萬8千字的上書由梁啟超和麥孟華兩人抄寫了一千份，遍傳京都，總字數為1,800萬字的文件，如何在沒有影印機的時代短時間內手工抄寫複製？所以，這樣的歷史細節當為不可能。<sup>20</sup> 通過這一反證，我們可以提醒歷史學者應當時時警覺所使用材料的時空屬性，發現更為有價值的問題。

### （三）新媒介：圖像與影像

圖像作為材料並非始於現代，但以圖像作為材料歷史研究的材料

<sup>17</sup> 史學界將法國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百多年稱為漫長的十九世紀，而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上個世紀90年代稱為短暫的二十世紀，這兩個世紀由於市場經濟與科技手段的不同，其社會發展的速率有顯著差別。

<sup>18</sup> 參見茅海建：〈「公車上書」考證補一〉及〈「公車上書」考證補二〉，《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4期。

<sup>19</sup> 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54，頁587-592。

<sup>20</sup> （清）康有為：《我史》（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4、25。該書又稱《康南海自編年譜》。

卻是近年才興起的一種新方法。圖像以及影響對社會事件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是我們都活生生的感受到的，後來的歷史學家該如何利用和界定、解讀這些文獻，都是文獻學所面臨的新課題。<sup>21</sup>

也正是由於當代社會所面臨的視覺衝擊，使得諸如藝術史研究這樣一些領域開始介入更為廣泛的社會生活之中，「藝術史研究的物件不再局限於『精英藝術』和『高雅藝術』，而逐漸擴展到『大眾藝術』和『通俗文化圖像』……研究方法也不再局限於本學科的理論方法，而是選擇和吸收了其它相關學科的方法和理論體系，如符號學、現象學、闡釋學、社會學、心理學、解構主義等研究理論」，美國芝加哥大學米切爾教授甚至指出「當前學術界和公共文化領域正在發生一種錯綜複雜的轉型」，這一轉變被稱為「圖像的轉向」。所謂的視覺或者圖像研究，與傳統文獻的不同在於：「它能提供一種迥異於以文本為基礎的人類學領域傑出實踐的聲音」。<sup>22</sup>實際上，圖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本身就是文字的源頭，與文字語言有著密切的關係。楊曉能通過對大量商周時期青銅器裝飾圖紋的研究，認為傳統上劃分為兩個不同範疇的書寫、銘文、符號與圖畫、雕塑紋飾之間，存在一種「介於兩者之間又與兩者互有重疊的視覺媒體」，稱之為「圖像銘文」，是「一種未能識別出來的新媒體」。他聲言：這種「動物圖像銘文可能是史前跨地區、跨文化遠祖動物崇拜或共同崇尚的動物神靈的遺存和表記」，我們應該「在此基礎上著力研究一些根本性、跨文化、跨文明的問題」。<sup>23</sup>而柯律格（Craig Clunas，1954-），則通過明代圖像的研究，指出中國古代畫像中存在模仿與敘事、自我指示與象徵等表現機

<sup>21</sup> 參見方維規：〈再論新媒介的能量〉，《社會科學論壇》2009年第5期，頁62-73。

<sup>22</sup>（美）詹姆斯·埃爾金著，雷鑫譯：《視覺研究：懷疑式導讀》（南京：鳳凰傳媒出版集團，2010年），頁2。

<sup>23</sup>（美）楊曉能著，唐際根、孫亞冰譯：《另一種古史：青銅器紋飾、圖形文字與圖像銘文的解讀》（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頁201。

制。<sup>24</sup> 這提示我們，圖像不但存在敘事性，而且在暗示與象徵、烘托與強化等手法上有著文本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就圖像與文本的關係來說「不僅僅是爲了讓它們彼此互證，而是要它們聯合起來重構知覺世界的浩瀚圖景」。<sup>25</sup>

對於歷史學而言，「圖像的轉向」只是大眾文化激盪下的一種應有的姿態。而將圖像作爲歷史學的材料，卻存在著巨大的困難。這種困難一方面來自於材料本身的性質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來自於脫離具體文字的敘述而產生的解讀的不確定性。但是，如果我們承認無論是歷史中的人還是現實中的人，其行爲都存在一個「觀念—認識—個人行爲—社會行動」這樣一個互動的鏈條的話，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圖像在觀念傳達與塑造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個人觀念普遍化和通俗化的過程中，圖像具有更強大的傳播與闡釋能力。

鄭岩與汪悅進通過對山東省安丘縣庵上鎮一座清代道光年間建造的石牌坊「庵上坊」的圖像、文字與口述歷史的綜合研究，將組成這座石牌坊的各種建築元素、圖案、花紋在傳統文化與地域文化中的含義、象徵進行敘事化的體驗與解讀，並結合對當地的口述採訪，建立了一個以「庵上坊」爲中心的從清代到現代、從貞婦到工匠、從家族到地域的多維度、長時段、一直延伸到當代的一部歷史敘事。<sup>26</sup> 在這部活著的歷史劇中，精英階層的忠孝貞節觀念與底層百姓的情欲愛憎觀念之間充滿著張力與解構，但又總體上調適在一致的傳統道德倫理秩序之中。如果離開「庵上坊」這座傑出的清代建築的具象圖像，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理解這種矛盾是如何協調的存在於晚清山東地方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sup>24</sup> (英) 柯律格著，黃曉娟譯：《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4。

<sup>25</sup> 汪悅進：〈夢的邊界與消解的身體：作爲鏡殿的佛教石窟寺〉，收於(英) 德波拉·切利編：《藝術、歷史、視覺、文化》(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0年)，頁26。

<sup>26</sup> 鄭岩、汪悅進：《庵上坊：口述、文字和圖像》(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

### 三、範式的轉變（一）：新技術與變革

傳統典籍從書籍要素與載體形式上有著固有的特點。我們每天都在閱讀書籍、面對書籍，但很少想到何為書籍？究竟是何種要件構成了書籍。考察內容、作者、載體（簡、帛、板、片、紙）、版刻等要素，來比對傳統典籍，就可以看出很多問題。以一部經典《老子》為例，現代學者已經考證清楚，該書的作者絕非李聃，從時間上考證該書出於戰國之際，從載體上有書於竹和帛的區別，那麼我們可以宣稱《老子》一書為偽書嗎？《老子》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我們很難做出這樣的判斷。傳統「經部」典籍中「易類」的著作，多被目為經中之經。但這些解經的著作大多是層層因襲的，被標為著者的人也許在一部書中發表的評論極其有限。但通過內容組織形式的改變與點評議論，著者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這是中國傳統典籍的特點，也有一種「公共性」在裡面。宋元以來，版權的意識有所發展，朱熹在自家所刻的書後常常印上「如有翻刻，千里必究」的字樣。這又有一種「私權利」在裡面。影響到以此類文獻作為材料的研究，我們不太對文本自身的資訊做精細化的處理和考察，籠統地以某個人、某部著作作為對象的研究比比皆是。

#### （一）我們可以如何解讀文獻？

近幾十年來，現代語言學、分析哲學與符號學等新學科的長足發展，使得我們對文本、字句、語詞的重視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現代資訊科學的發展使得我們得以借助數位化的手段來重新處理這些傳統文獻，精細化分類的資訊著錄立即為我們提出許多新的問題，我們曾經經常使用的材料也變得非常難以判斷。比如，在觀念史變遷研究中，觀念的提出與流傳都借助於文本，而對於文本我們必須細分才能確定其時代。以我們都熟知的文獻為例，以下幾部文獻如果不進行具

體每篇的標引，我們無法進行引用：

1.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

所收為作者發表於《近事錄》、《迴圈日報》文章，1873年開始。結集於《弢園文錄外編》，1883年刊行於香港，1887年上海又重刊。

2. 鄭觀應《易言》與《盛世危言》：

《易言》36篇本初刊於1874年香港（鄭說），一說為1880年中華印務局。20篇本為1882年。1891年改寫為《盛世危言》，1894年《盛世危言》5卷本刊行，1895年增訂新編為14卷本，1900年又編為8卷本。

3. 何啓、胡禮垣《新政真詮》：

1887發表《書曾頡剛〈中國先睡後醒論〉後》，1894年撰寫《新政論議》，1895年刊出；1898年刊出《新政安行》，1899刊《勸學篇書後》、《新政變通》。1902年匯集上述文章為《新政真詮》六編出版。

實際上，每個文本都對應著至少三種時間關係：寫作時間、發表時間（或結集出版時間）、引用與評論時間，這三種時間對於不同的研究者具有不同的意義：寫作時間對於傳記與個人史的研究是有意義的，發表時間對於傳播史的研究具有意義，而引用與評論則對接受史具有價值。傳統的思想史或學術史的研究，注重概念和發生主體，並不引入傳播與接受對象這一維度。所以，我們關注的重點乃是某位作者什麼時候提出了某個思想和某個概念，以此為座標來進行研究。而現代觀念史發展為一門日益精密的學科，它借助於多種手段對文獻與概念進行分析處理，特別是對思想發生與歷史文獻的客觀對象進行自我反省，指出正是借助於「他者」的傳播與接受，使得思想與歷史紀錄才變得有意義，否則僅僅是存在於個人頭腦中和原始紀錄中的中繼資料只是一堆毫無意義的「斷爛朝報」。因此，現代觀念史研究更注重原始概念與紀錄與其傳播、接受客體之間的互動關係。正是在「原始創作者—傳播媒介—受眾回饋」的知識史模式中，我們得到了更為

深入與全面的認識，從而對傳統思想史研究實現了某種突破。

因此，在利用資料庫等方法作為輔助對進行觀念史研究，必須對每篇文章的寫作年代進行確定，我們才可以將其當作材料來使用，否則其說明能力和效力都將有所不同。這也是各種專業資料庫以篇為單位進行標引的原因。這也為觀念史研究以關鍵字與句子為中心創造了條件。

從歷史文獻的角度來看，文本中年代的問題更為複雜，一個文本對應的至少有以下幾種時間座標：編纂成集時間、紀錄時間、紀錄內容中事件的發生時間等幾個層級，如果研究者在資料庫中閱讀文本的過程中對這些年代進行標注並回饋給系統，那麼此後的使用者就可以看到歷史事件所涉及的多重年代關係。這在我們最常用的「二十五史」中尤其值得重視。正史是繼任的朝代對前任朝代的歷史紀錄，史料多採用前任朝代的原發性史料，但價值系統多為後繼朝代的，因此從史實與評價方面，都需仔細甄別。

初讀《明史·莊烈帝本紀》，至十七年謂：「春正月庚寅朔，大風霾，鳳陽地震……乙卯，幸正陽門樓，餞李建泰出師。南京地震。」讀後讓人大為駭異。這一年是1644年，也是明朝的最後一年，正月初七日京師發生大風霾，而鳳陽是明帝皇家的祖陵所在地，南京則既是明朝的南都，又是建國之都城。這三個標誌性地區接連發生異象，不得不讓人發生聯想。及讀至莊烈帝自去冠冕，以髮覆面，自盡於煤山，《本紀》的「論贊」曰：「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疑惑才豁然得解。原來，特意挑選的種種異象，都強烈暗示著明朝國祚轉移，氣數已盡，天命歸清。<sup>27</sup>

查閱編纂《明史》所依據的重要文獻《崇禎長編》，崇禎十七年有如下紀錄：「甲辰，保定地震」、「戊子，福建地震」、「辛卯，廣東

<sup>27</sup>（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卷19，〈莊烈帝本紀·崇禎十七年〉，頁232。「天命歸清」原文為「大命有歸」。



地震」。大風霾的天氣則隨時都有，這在明清兩代都為常見天氣。<sup>28</sup> 由此，《明史》編纂者選擇性使用材料的動機昭然若揭。在崇禎十七年的歷史敘事中把這三個特殊地區的特殊事件擺放在一起，刻意營造天命轉移的象徵，則是清初《明史》編纂時代的官方意識形態。康熙十七年正在「三藩之亂」之際，清朝開「博學鴻儒」科，網羅尚未認同的明遺民進入仕途，打的就是修《明史》的旗號。次年開明史館，大修《明史》，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論證明、清易代的合法性。經過多次修改得《明史》於乾隆初年正式刊定，則標誌著清代官方正統觀念觀照下的正統「明史」敘事的完成。這段歷史紀錄背後的觀念乃如是觀。歷史紀錄與歷史觀念的錯位，造成歷史解釋的障礙，不可忽視。

時間維度的精確標引使得按照時間座標對關鍵字使用的統計與分析成為可能，而頻度這一向量的使用又使得我們可以對其影響度、傳播度做定量分析，這是資料庫技術帶給我們的巨大輔助。

同樣，傳統文本傳播的空間過程是模糊的，概念與語詞的空間性更是無法認識。但是，地理資訊系統與地名詞典的鑲嵌功能，使得我們同時得以考察某一關鍵詞的空間屬性。在資料庫中，文獻的地理資訊通過多個層級來標引。首先是作者的寫作地，其次是發表出版地（報刊），然後是內容中所指涉地。在經過數位化處理的文本中，這一系列資訊是以代碼的形式附著在文本中的，不會影響文本的瀏覽界面。只在檢索和分析時接受調用的指令。目前有研究瘟疫與傳染病以及災害史的學者在採用這樣的辦法對文本進行處理。可以想見，一旦進行了這種標引，我們通過資料庫不但可以得到關鍵字使用的時間曲線，而且還可以得到其空間分佈信息。如果時間和地理資訊得以整合，則可以得到統一的時空模型。

我們閱讀資料的過程，是通過一個個關鍵字、或鑲嵌關鍵字的句式來實現的，無論是觀念史研究，還是政治史、經濟史研究，都是

---

<sup>28</sup>（清）汪輯：《崇禎長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卷2，〈崇禎十七年〉，頁198。

如此。但關鍵字本身的涵義並不唯一，研究者很注意避免「望文生義」，就是這個原因。在資料庫中對查詢到的關鍵字進行義項判定，同時將這些義項回饋給系統，那麼我們看到的關鍵字就會自動給出研究者所標注的幾種義項，以供辨析。例如「民主」這一概念，根據學者綜合各種文本中的意義，具有以下幾個義項：1. 民之主（傳統帝王），2. 民作主（德先生），3. 選舉領袖（如晚清將美國總統稱為美利堅民主），4. 共和制（民主國）。<sup>29</sup>可以看出，同樣是「民主」一詞，其各種含義之間的差別很大。經過如此義項判別，我們在閱讀談論民主的文本時，能夠更加精確的區分其指向和意義。

此外，語境中的關鍵字大都可以區分出三種屬性，肯定、中性、否定。對關鍵字做出屬性判別，對於我們判定支援性證據或者否定性證據的量化處理提供了條件。

可以看出，由於現代資訊與數位技術提供的條件，我們解讀文本的方式具有了向深度、精細、關聯的方向進行的可能，傳統的解讀方式正在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 （二）沉默的事實：發現未知的聯繫

從龜甲獸骨到簡帛文書，從紙書版刻到近代報刊，文獻載體發生變遷的同時，是知識的加速度累積。先秦時代韋編三絕、車載斗量的載籍，不如清代經卷一匣之量。在幾千年文獻載體的變化中，不易察覺的是閱讀模式的變化。經過清代大規模的古籍編纂整理，乾嘉以來的學者閱讀體驗已經與前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清人考據之作，動輒遍引群經，曲盡文獻淵藪，知識累積使然也。然而個人閱讀之範圍，終究有限。即便近代公共圖書館制度之引入，學者個人查閱檢索的力量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之中，更顯渺茫。而進入現代社會，資訊技

---

<sup>29</sup> 見金觀濤、劉青峰：附錄二〈百個現代政治術語詞意彙編〉，收於氏著：《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534。

術的快速發展，使得文獻的轉化和知識的生產模式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知識的迅速更新與積累，對歷史的遺忘和代謝也在加劇，使得許多重要的歷史事實都被淹沒、塵封在歷史文獻中，依靠個人的閱讀力量很難窮盡文獻以及發現某些隱晦的事實。但是，借助於儲存海量文獻的大型資料庫的挖掘、統計等功能，為我們提供了在更廣闊的文獻範圍來思考和提出問題的條件。

以現代「科學」在中國的轉化過程的研究為例。西方物理學在明末已經經過天主教傳教士傳入中國，明末思想家方以智說：「萬曆年間遠西學入，詳於質測而拙於言通幾。」<sup>30</sup> 徐光啓等人將以當時的認識將西學分為道科、治科、理科、醫科、文科，並且以格致之學統稱新傳之西方科學。<sup>31</sup> 以格致之學指稱西方科學，對於宋明以來的中國學術來講，是非常傳神而準確的。宋、明知識體系中的格致之學，除了道德上的修身之外，更多指對於具體事物的研究，如清初陳元龍撰《格致鏡原》一書：「每紀一物，必究其原委，詳其名號，疏其體類，考其製作，以資實用。比事屬辭，非所及也。」<sup>32</sup> 這說明，以實驗、實證為特徵的西方科學與中國傳統格致之學有某種契合性。但是，傳統意義上的「科學」一詞，在中國典籍中的含義則是科舉之學、分科之學的含義。到了晚清時期，由於翻譯新書和制造船炮的需要，新式學堂在中國興起，其所教內容則為現代西方科學，多稱為格致之學。而傳統體制下的學校，因為主要作為科舉儲備人才的場所，學習內容主要為經學。格致之學與科舉之學顯然存在著某種張力，格致之學對應的是西方傳來的“science”或者其中的某個學科，科舉之學又則對應的是傳統科舉中的分科之學。科舉甚至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引入西方現代政治制度和科學知識系統的巨大障礙。但是，在隨後的幾十

<sup>30</sup> 方以智：《物理小識·自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1。

<sup>31</sup> 魚宏亮：《知識與救世：明清之際經世之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68。

<sup>32</sup>（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凡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1。

年中，格致之學對應西方科學的用法迅速減少，而以科舉之學的「科學」指稱西方科學的用法成爲主流，直至今天，科學早已失去了其「科舉之學」的含義，成爲翻譯現代“science”的標準概念。顯然，觀念史中，格致、科舉、科學三個概念之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觀念史的任務就是，通過這種語言和概念變化的痕跡，尋找被淹沒的歷史與社會事件。但是傳統閱讀手段，很難找出其中的聯繫。在這裡，統計與關聯檢索等手段，就顯示出重要的意義。

金觀濤、劉青峰使用專業資料庫在關鍵字統計時發現，在1895年以前，「格致」都是用來指涉西方“science”，而1905年後，「科學」則成了“science”的專有譯名。統計表明，在1901至1905年之間，格致（science）與「科學」（科舉）之間存在著相似的使用頻率，這對應的是這一時期傳播新學的學堂與學習舊學的科舉制並存的事實。但是，如果不瞭解科舉與科學之間的隱密聯繫，就無法理解科學迅速取代格致的這一過程。在採取在同一篇目中檢索同時出現格致／科學與科舉／科學的關聯檢索統計中，發現在科舉／科學同時使用的文本中，發現科學一詞曾經與學堂有著緊密聯繫，原因在於學堂採用分科教學的制度，晚清文獻中也將分科教學稱爲科學。而分科教學，正是現代西方科學的重要特徵。這樣，科舉與科學（science）之間具有了某種聯繫的紐帶，學堂教育的重要特徵被以「科學」來概括，增加了傳統格致用來指稱的內容。而一項對「學校」與「學堂」同時使用次數的統計表明，清政府在1901年開始普及新式教育至廢科舉前後直到1910年間，「學堂」與「學校」一詞在各種文獻中的使用頻率相當接近。這顯示清末新政中學堂與學校都被重新賦予新的意義的過程，「新」作爲晚清學術的一個正當價值得以確立，這樣「格致」這樣的舊有稱謂開始退出日常使用，「科學」一詞中的「科舉」含義隨著1905年科舉制的廢除而開始淡化，最終以「科學」來指稱“science”的用法被固定下來。這種固化包含著新的意義的賦予，新科學的概念既不同於傳統格致的範圍，又不局限於分科之學的形式，有了新的

意識形態的特徵，這也是新文化運動得以發生的新基礎，是中國現代社會的新道德。<sup>33</sup>

通過這個研究的分析我們發現，如果沒有以海量文獻為基礎的大型資料庫以及資訊技術中統計、分析、關聯、資料採擷等方法的應用，對於「科學」這個對當代社會有著籠罩性影響的意識形態在中國的發生過程，我們又有多少瞭解呢？

## 四、範式的轉變（二）：在語言與思想之間

### （一）語言：思想的符號

「自二十世紀哲學研究實現了語言學轉向後，語言學和哲學的交匯產生了十分重要的成果。其中一個基本觀點成為學術界的普遍共識，這就是當某一種普遍觀念在歷史上存在過並轉化為社會行動時，我們一定可以找到語言學的證據，因為任何觀念的表達、流傳（成為社會化的普遍觀念）都離不開語言。無論是普遍觀念轉化為社會行動，還是社會行動反過來改變普遍觀念，都可以通過表達有關觀念的關鍵字的意義分析和使用頻度統計來證實。」<sup>34</sup>

採用關鍵詞來研究觀念史，對傳統思想史研究而言，提出了一個根本問題：由各種概念、表述組成的思想建構，存在著許多不確定的地帶。回歸關鍵字，就是回歸到重新界定概念。而詞語本身，根據現代語言哲學的研究，是需要進一步進行解構的物件，詞語所攜帶的義涵並不是固定如此。這種經驗在日常語言的使用中我們都有經驗，但在哲學上卻帶來了全新的解釋，即能指與所指的不確定關係。

<sup>33</sup> 具體統計分析和論證過程，參見金觀濤、劉青峰：〈「科舉」和「科學」——重大社會事件和觀念轉化的案例研究〉，收於氏著：《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411。

<sup>34</sup> 金觀濤、劉青峰：〈歷史的真實性：試論資料庫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利用〉，收於氏著《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447。

錢鍾書（1910-1998）在討論陸機《文賦》時指出，詩歌表意的特點是「文一物一意」三者之間的不稱不逮。文在，但文不足；意在，但意不稱。「表達意旨」過程越過了「所指之事物」指向「思想或提示」，「文詞虛而非偽，誠而不實」<sup>35</sup>觀念的研究適如詩意的捕捉，所不同者，唯詩意無須言說，而觀念卻要層層剖析。因為觀念最終連接著人的行為，甚至社會行動。如果沒有一套嚴密的方法來界定符號背後的指涉，我們即不可理解社會與歷史。

錢鍾書指出文本理解中「文在，但文不足。意在，但意不稱」的現象，實際上並不僅僅存在於詩學的領域。在中國思想史的領域甚至更為突出。《道德經》五千言，卻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首句即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這種經典如何實現闡釋？我認為有兩種機制導致了闡釋的可能：其一，能指與所指的不確定性和多樣性，使得閱讀者可以借用多種義涵來理解詞義。又比如「仁」，孔子從來沒有將某個辭彙固定在「仁」的理解上，而是多方面的指出種種「仁」的樣貌，閱讀者也只能從所指的多維性來理解這樣的經典，那種聲稱獲知經典的確定意義的闡釋是令人起疑的；其二，閱讀者自身儲備的觀念圖像的介入。閱讀者對經典所在時代的總體觀念儲備與個人認識儲備的愈豐富、愈準確，那麼對原典的理解就愈接近經典本身。當然，這並不包括以今人觀念來亂彈經典的所謂現代性闡釋。中國思想中有許多「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觀念，正是通過上述機制獲得理解的。縱觀中國傳統文化的闡釋史，當不難體會上述論說。

1903年，張之洞上《奏定學堂章程》中列出一個反對使用新名詞的名單，其中就有「觀念」一詞。張之洞認為「如報告、困難、配當、觀念等字，意雖可解，然並非必須此字。」<sup>36</sup>以「觀念」一詞來

<sup>35</sup> 錢鍾書：《管錘編》（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頁166。

<sup>36</sup> 邨爽秋等：《教育行政之理論與實踐》（南京：教育編印館，1935年），頁5。

翻譯 idea，符合宋明理學關於心性的解釋，念頭一詞是用來指內心的想法。所以張之洞還是可解的。但日後，正是這些新名詞在近代觀念變遷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胡適曾說新文化運動其實是新名詞運動，「一些抽象的，未經界定的文詞發揮了魔幻而神奇的效力」，「別小看一些大字眼的魔幻力量」。其實即說明了新名詞、新概念建構現實的力量。<sup>37</sup>

## （二）關鍵字何以成爲可能

戴東原作《孟子字義疏證》，自謂「僕生平著述最大者爲《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sup>38</sup>《疏證》從《孟子》一書選擇「理」、「天道」、「性」、「才」、「道」、「仁義禮智」、「誠」、「權」八個關鍵字，逐個解釋，遍引經書，合類比義，對每個概念進行疏解，從而得出：「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雖憐之。」<sup>39</sup>通過對這些詞義的辨析功夫，戴東原揭示了理學存在「以理殺人」可能性，由此發起了一場對程朱理學的革命。其分析方法和歸納思想，被稱爲中國科學主義的源頭。胡適之說戴震：「他的治學方法最精密，故能用這個時代的科學精神到哲學上去，教人處處用心知之明去剖析

<sup>37</sup>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譜系·自序》（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頁1。關於晚清新名詞對社會運動的建構作用，亦見黃興濤：《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史意義發微——兼談對於「一般思想史」之認識》，《開放時代》2003年第4期。

<sup>38</sup>（清）段玉裁：《東原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頁186。

<sup>39</sup>（清）戴震著，楊應芹、諸偉奇主編：《孟子字義疏證·理》，《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卷6，頁161。

事物，尋求事情的分理條則」。<sup>40</sup>《孟子字義疏證》在乾嘉時代注重考據訓詁、輕視心性義理的總體學術範式中的確具有沖決性的作用。其最顯著的不同在於，考據訓詁之學重字、詞之「意」，是語言學的。但東原則更爲重視字、詞之「義」，是觀念史的。「由詞達道」帶來的是境界的提升，關鍵字之力量，由此可見。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經過晚清的一再衝擊，經歷了一系列幻滅與重構的痛苦過程，但真正爲現代思想重塑的，是新文化運動的大洗禮。眾所周知，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兩大旗幟。金觀濤、劉青峰利用資料庫對這兩大觀念進行了關鍵字研究。他們採用了包括《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每週評論》、《嚮導》等十二種在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影響的期刊建立全文資料庫，通過檢索「民主」與「科學」兩個辭彙，以及指涉含義相同的「共和」、「民治」、「德謨克拉西」等辭彙進行統計分析，發現「民主」觀念的傳播遠遠在「科學」觀念之下，而且以負面含義使用「民主」一詞佔據將近一半的數量，而「科學」一詞則幾乎全是正面的含義。<sup>41</sup>從關鍵字是觀念的表達與傳播載體這一理論出發，發現隱蔽在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表像背後的一個歷史事實：近代中國「民主」觀念的發展遠遠沒有「科學」觀念那樣成功。

對於如今的中國人來說，科學掛帥的盛行與民主實踐的曲折只是一種常識性感受，但在學理上發現其根源卻是一個卓越的創見。

金觀濤在分析戴震的思維模式時說，他一方面堅持知識性常識爲合理性基礎，另一方面又把欲望看作道德的基礎，所以在戴震的思想中呈現合理性最終判斷與道德價值推衍模式處於不能整合的狀態。這種斷裂形態正是新文化運動後自由主義者思想形態的先驅：「自由主

---

<sup>40</sup> 胡適：〈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胡適文存》（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3集，頁74。

<sup>41</sup> 金觀濤、劉青峰：〈《新青年》民主觀念的演變〉，收於《二十一世紀》1999年第6期，頁29-41。



義者大多一方面主張用科學知識來論證科學人生觀的合理，將科學常識作為合理性的最終判斷；但與此同時卻堅持個人主義立場，主張由內向外的推出道德，據此中國自由主義者認同人權、個人獨立和民主程序。由內向外、由個人向集體的道德正義與所謂的科學人生觀始終處於不能整合的狀態。這同戴震的思維模式同構。」<sup>42</sup>

這裡，觀念模式顯示了令人驚歎的穿越歷史的力量。

## 五、為什麼是觀念史：歷史研究中的表象與本質

歷史學究竟更具有科學性抑或更具有藝術性，歷史學是否具有客觀性，歷史學是否以真實作為自己的目標，這些問題抽打著每一個歷史學者。毫不諱言，語言與思想之關聯，關鍵字之於觀念，能指與所指，符號與象徵，這些方法都來自於後現代主義影響。但是，為什麼觀念史的研究具有獨特的意義？

試舉一例：中國古代有「日蝕救護」的禮制，《左傳》魯昭公十七年（525B.C.）六月發生一次日蝕，祝史向執政季平子申請救助所需錢幣，季平子不予。學者昭子評論說：「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也。」唐孔穎達《正義》解釋說：「日蝕，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蝕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日蝕，乃是不君事其事也。」<sup>43</sup>日、月蝕等天象在中國古代史被紀錄非常完整的自然現象，但圍繞著日蝕的發生規定有救助的禮儀以及政治的避諱與陰謀，是單純的日蝕紀錄完全難以解讀的。漢成帝的丞相翟方進因為「日蝕」異象，代君自殺而亡。這些歷史紀錄，必須輔助於古代天人感應的觀念才能夠理解，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天人感應觀念的發現，這些歷史紀錄將是無

<sup>42</sup> 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96。

<sup>43</sup> （清）阮元校勘：《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48，「昭公十七年」，頁2082。

意義的。

但是，無論是蘭克史學還是中國傳統以歷史敘事為主要特色的歷史著作，為什麼在我們看來又都是可以理解的呢？事實上，我們正是閱讀著此類作品成長起來的。原因在於，這些著作存在著隱性的觀念調用機制。這種機制分為兩個層面：

其一，歷史著述者潛在的行為／觀念解釋邏輯。以天象與社會行為為例：「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市疑會否，共諮尚書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劭在坐，曰：『梓慎禘灶，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以變異預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及眾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sup>44</sup>元旦朝會，是古代政治最大的禮儀。而這一儀式因為日蝕的預報而能否如期舉行，關係重大。劉劭對朝會／日蝕事件的解釋含有三大論據支持：天變不時、歷史經驗、聖人垂制。這三大論據都指向一種觀念：天人感應思想下的災異觀念。在漢晉時期天象還不能準確預報的時代，這代表著理性化對天人感應觀念的一種有限度的矯正。這裡，我們看到敘述者通過歷史記事將漢人「天人感應」觀念展現在事件的描述背後。

其二，閱讀者參與觀念建構的歷史理解模式：仍以「救日」為例，「救日」這一禮制直到清代都舉行如儀：「日蝕救護，順治元年定制：遇日蝕，京城文武百官俱赴禮部救護。康熙十四年（1675），改為欽天監推算時刻分秒，禮部會同驗准，行知各省官司其儀。凡遇日蝕，八旗、滿、蒙、漢軍都統、副都統率屬在所部警備，行禮救護，順天府則飭役赴部。」<sup>45</sup>這一段歷史記述，並未交代事件與行為的觀念依據，是不是可以理解？這取決於閱讀者頭腦中的觀念史圖景的知

<sup>44</sup>（唐）房玄齡、褚遂良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19，〈禮志第九·禮上〉，頁667。參見關增建：〈日蝕觀念與傳統禮制〉，《自然辯證法通訊》1995年第2期，第47-55、80。

<sup>45</sup>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91，志六十六，頁464。

識儲備。就我個人的理解而言，經過明清之際耶穌會士的大力推廣，採用科學方法預測天象已經非常準確，康熙對數學、天文的熟悉喜好程度亦不可同日而語。顯然很難僅僅用「天人感應」的觀念來解釋清代的「日蝕救護」。漢代「天人感應」觀念下「日蝕」所警告的是皇帝本人，而清代大動干戈地「救護」規定，甚至各行省都有相應措施，我們可以看出天象與皇帝德行之間的聯繫已經發生了剝離。清初官方開始建構以朱子學為中心的政治文化，「天理」和「天道」在康、雍、乾三朝是政治權威終極合法性的依據。所以，我理解，如此全民動員的「救日」禮儀，措施上重在宣示武力威懾以及警戒意味，與捍衛「天道」有關，也即捍衛政權的合法性有關。因為這一時期是論證滿族入主中原合法性的時期。這個理解是否符合歷史真實，也許對，也許不對。通過調用個人觀念資源，我們還可作出其它解釋。但符合歷史真實的前提是，我們調用的個人觀念儲備同時符合事件發生場域的整體觀念。

在大多數對話與事件的場合，行為背後的指導性觀念是無須言說的，以「共識」存在於語境中。正是因為在相同的觀念圖景下，所以敘述者對言說、行動者對行為的邏輯往往是「習焉不察」。但是歷史文本的特殊性在於，時間保留了對話的語言與事件紀錄，卻遺失了指導行為的觀念體系。這些觀念有的是顯性的，有的卻是隱晦的。歷史研究不但要通過連綴歷史紀錄還原完整的事件，更要還原事件背後的觀念。否則，這種事件要麼不可理解，要麼就遠離了歷史客觀性。我們看到大量歷史觀念與歷史事件紀錄錯位的所謂歷史研究，雖然早已為後現代主義所病詬，但這種病詬並無偏見，是歷史研究中確實存在的事實。

個人行為是個人觀念支配下的行為，社會事件是群體觀念支配下的行為。即便瘋癲也有扭曲的觀念形態存在。金觀濤用「籃球 DVD」的例子，生動地說明了觀念與歷史事件之間的關係。「觀念史圖像中

的事件」是我們重建歷史真實的充要條件。<sup>46</sup> 這個理論既克服了「蘭克史學」完全排斥個人觀念的純客觀性歷史真實的的缺陷，又解答了後現代主義關於歷史學純主觀建構的譴責。在觀念／事件模式下重建了歷史客觀性與歷史真實。任何歷史事件都是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的思想，為關鍵字、觀念史研究、資訊科學與歷史學結合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這一思想實際上是歷史學範式的革命性創造。

陳寅恪先生嘗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sup>47</sup> 我想，就我們這個新事物層出不窮、日新月異的時代，歷史學家所能遭遇的新學術，也不過如此吧。

## 六、結語

今天，我們使用著現代科技提供給我們的方便輔助，資料庫所帶來的資料利用的便捷，並未稍減歷史學家對於歷史事實進行考證與闡釋的傳統工夫。正如陳寅恪先生對有清一代蔚為大觀的金石學成就所作的評論：「自昔長於金石之學者，必為深研經史之人，非通經無以釋金文，非治史無以證石刻。群經諸史，乃古史資料多數之所匯集。金文石刻則其少數脫離之片段，未有瞭解多數匯集之資料，而能考釋少數脫離之片段不誤者。」<sup>48</sup> 傅斯年先生主持中研院史語所的工作，推行「借鏡他人所長，鼓吹史料的擴大與徵集」，同時也重視「文獻

<sup>46</sup> 金觀濤、劉青峰：〈歷史的真實性：試論資料庫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利用〉，收於氏著：《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頁425。

<sup>47</sup> 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36。

<sup>48</sup> 陳寅恪：「序文」，收於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

典籍的解讀與詮釋」。這兩方面的重視，適如我們如今對於新方法與老功夫的感受。

最後，讓我們以考據與義理兼通的近代科學主義的先驅戴東原的話作為向新觀念史的探索者的致意：「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sup>49</sup> 在這個歷史研究碎片化的時代，讓我們不要忘記有學者為探索中國歷史的模式、結構所做的艱苦努力，不要忘記中國文化對「道」的終極意義的追尋。

（責任編輯：曹庭瑄）

---

<sup>49</sup>（清）戴震著，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卷6，頁370、378。

## 徵引書目

- (清) 方以智：《物理小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譜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
- (美) 何偉亞著，鄭常春譯：《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衝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 李炳南：《辛亥革命起因之分析》，臺北：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碩士論文獎助出版委員會，1987年。
-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 汪楫：《崇禎長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
- (唐) 房玄齡、褚遂良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
-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英) 柯律格著，黃曉娟譯：《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 (清) 段玉裁：《東原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1999年。
- 胡適：《胡適文存》，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
- 徐中約：《中國的奮鬥1600-2000》，深圳：中國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
- (美) 海頓·懷特著，陳新譯：《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江蘇：譯林出版社，2004年。
- (清) 康有為：《我史》，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
- (清)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9年。

(清) 陳元龍：《格致鏡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魚宏亮：《知識與救世：明清之際經世之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美) 楊曉能著，唐際根、孫亞冰譯：《另一種古史：青銅器紋飾、圖形文字與圖像銘文的解讀》，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

(美) 詹姆斯·埃爾金著，雷鑫譯：《視覺研究：懷疑式導讀》，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0年。

路康樂：《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英) 德波拉·切利編：《藝術、歷史、視覺、文化》，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0年。

鄭岩、汪悅進：《庵上坊：口述、文字和圖像》，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

(清) 戴震著，楊應芹、諸偉奇主編：《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版。